

从道家思想看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

陈霞



《道家哲学引论》陈霞著

科技与人文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人文的发展需要科技提供的技术手段,而科技的发展也不可脱离人文的启发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人文精神的发展与提升,是激励思想创新、凝聚人心、树立民族理念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只有发展经济同时重视文化,发展科学技术同时培育人文精神,才有社会的整体进步。今天的科技变革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具有与人工智能匹敌的AI系统已经胜任了人类的很多工作,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包括道家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随着历史长河的冲刷和积淀,在提升人文素养方面愈加彰显出积极意义,包含其中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在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传承和弘扬。

道家思想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下,先秦很多学派绝迹,但道家思想依靠其思想的独特、深刻而流传至今,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局面。佛教传入后,道家又与儒佛交流互鉴,并成为代表中华文化基本格局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之一。今天依然活跃,且日益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现代人在追求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积极力量同时也在转化为破坏性的力量,带来了环境、资源的生态问题,以及商业化、世俗化、消费主义等问题。老庄所主张的“道法自然”“无

为而治”“无用之用”等对文明的反思、对自然的回归、对真性的追求等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道家思想所表达的对宇宙、生命、社会的认识较易同当代人的心灵沟通。在国外,《道德经》译本的种类之多仅次于《圣经》。据美国汉学家郁谦德统计,目前累计有96种语言,多达2030种译本,可以说全球95%以上的识字人口均可通过母语阅读《道德经》。

道家与科技有紧密的关系。从历史看,道家思想与古代科技发展密切相关。道教以追求长生成仙、实现生命的不朽为出发点去观察自然,古代道士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也是其时代的科学家,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深化了对人体自身、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现代科学家与道也有不解之缘。据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的回忆,1943年他去爱因斯坦家做客,发现书架上的书不多,但却放着一本德文版《道德经》。陈省身还指出,西方不少科学家喜欢老庄哲学,崇尚道法自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花费近50年时间编撰了共七卷30余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领先于世界。他取的中文姓名“李”(李约瑟),字丹耀,夫人的中文名也姓李,叫李大非,因为老子姓李。他对道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中国的现代道教学研究也始于科学家,如天津大学的工业化学家陈国符先生就长期研究《道藏》,奠定了对《道藏》的目录学及《道藏》中的外丹黄白术史料的基础研究。他1949年出版的《道藏源流考》是现代道教学的开山之作。

道家思想发展了古代的科学与技术,启发了当代的科学研究,但老庄也提醒世人,如果发了“道”,科技会走向人及其他生物的危害。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明确提出了“为学”和“为道”两种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由于“为学”和“为道”两者在认识对象、认识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益”和“损”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途径和认识方法。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为学”获得的是有关经验世界的知识,是科技理性得以认识和控制的,即科学世界,探索事物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是关于物的知识,是对经验和现象的分析、综合、判断,是人的学习、思考、实践。这需要我们认识世界,接受自然规律。

“为道”则是关于“道”的知识,“为道”使社会、人生成为它应是的样子,关涉精神世界、信仰世界、道德世界。老子提出“为道”,重点也在阐述“为道”,表明他看到了表现为人类经验和理性的“为学”是有不足的。这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在提倡科技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人文、遗忘大道。

《庄子》的“庖丁解牛”这则寓言刻画了一位身怀绝技的宰牛者。他宰牛之时“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简直像一场行云流水般的行为艺术。当文惠君问他技艺为何如此高超时,他回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庖丁虽然技艺已经出神入化,但他对道的喜好却超过了对技术活动的追求,给我们启迪了道与技双绝、游刃有余的生命智慧。

庄子还讲过另外一则故事: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搦辘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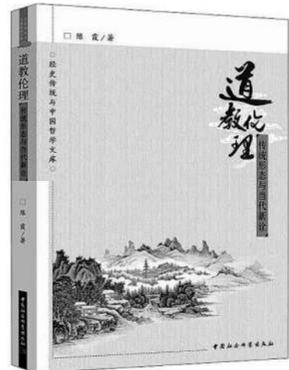
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决汤,其名曰槲。”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者必有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有机者必有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是多么深刻的洞见啊。庄子注意到机心会对人心产生破坏和分离,让人对之产生依赖,人对科技的掌握变成了科技对人的掌握。因为机械的过度使用会分割人的心灵,最终使人像机器那样运作,成为机器的附庸,甚至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致使人的情感和思维受损,让人失去想象力、创造性和思维能力。机械虽由人制造,但却可能不断地潜入人类生存空间的更深处。如果人类对物质永不停歇的追求把自然变成了征服和压榨的对象,那便会使人与技术的关系颠倒,使现代人失去根,失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老庄那个时代科技尚未迅速发展而对人产生影响,他们却对理性、技术、机械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果仅仅满足于“为学”,把认识的所有对象都等同为经验知识的对象,其缺陷是不能理解“道”的独特性,也不能给人提供存在的价值和人类社会的精神走向。科学就像GPS,它能告诉人们怎样到达目的地,却无法给人确定目的地。人生的方向、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为道”的领域。套用一句话,“为学是力量,为道是方向”。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是去控制自然,而是作为自然的一员,带着审美的心态融入自然,去领悟宇宙的奥秘以及人与万物的友好关系。所以在加强分离性、增长性的“为学”功夫外,道家思想提醒人们,不要割裂完整生命,保持好奇、保持想象、保持追问、保持奇妙思想的赤子之心,熏陶我们对生命的敬畏,对人与宇宙万物的珍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今天,“为学”和“为道”不能相互取代,我们应建立起“学”和“道”、科技和人文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既要有“为学日益”的加法和油门,也要有“为道日损”的减法和刹车,这才是安全有效的交通工具。“日损”让我们安静下来,静能生慧,带来生命的有序,以实现科技与人文的相互协调,人与人的和平共处、人与智能机器的协同进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道教伦理：传统形态与当代新论》陈霞著

传承与创新

穿越时空的黄河历史文献之旅

陈红彦 翁莹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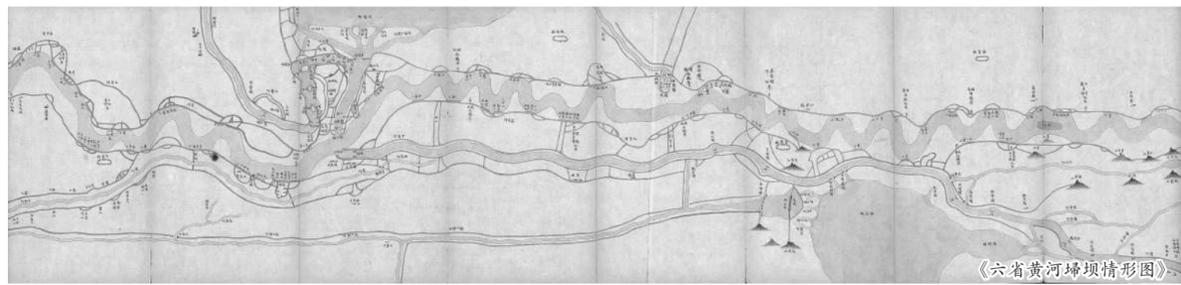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南依巍巍岳山,北临滔滔黄河。这里是黄土高原的终点,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也是黄河地上“悬河”的起点,可以一览无遗地领略黄河的“悬、险、荡、阔”,感受中华大地的博大、宏伟、壮丽和优美。现在,这里是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已经开放的一部分区域,而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则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链上一颗闪亮的明珠。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哺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的传说就起源于黄河流域。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上,黄河流域在其中3000多年里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这里分布着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出现了《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收藏有大量黄河相关历史文献。目前发现的有关黄河的最早记载出自国图收藏的一片甲骨,内容为“口行东至河”。这片甲骨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大约出自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此后,经过两三千年的积累,黄河文献不仅有专书、舆图、谕旨、奏议、传记、诗词、图说,也有见于正史、典志、实录、地方志、文集、笔记、类书、丛书中的散篇。国图收藏的黄河历史文献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书籍古籍,包括善本、普通古籍、地方志、民族语文文献等;一类是特藏,包括舆图、金石拓片等。

国图藏有约200种黄河相关古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尚书·禹贡》《管子·度地》《周礼·考工记》等文献中已经出现了黄河相关记载。唐贞元十四年(798年),贾耽完成了十卷本《吐蕃黄河录》,这是已知中国古代第一部以黄河命名的专著。遗憾的是,元朝以前的黄河专著均未能传世。国图收藏的黄河古籍中,有10多种出自元、明时期,其余均为清代文献。这些古籍的内容涉及黄河的方方面面。

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清代新辅的《靳文襄公治河方略》、清代张鹏翮的



《六省黄河堤坝情形图》

《张公奏议》,是治河实践著作的典型代表。潘季驯、靳辅和张鹏翮都是历史上的治河名臣,他们根据自己治理黄河的多年经验著书立作,记录了黄河的治理过程,详细叙述了疏河道、修险工、塞决口、筑堤防、建闸坝等治理原则和方法措施,对后世的黄河治理和水利事业影响深远。明代周堪撰的《河滨奏疏》、清代嵇曾筠的《防河奏议》、清代许振祜的《督河奏疏》等,是将治理黄河相关的皇帝谕旨、大臣奏疏等案牍材料加以整理后汇编而成的著作。这些案牍是直接反映治河过程的一手文献,对于还原历史、了解实情是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元代潘昂霄的《河源志》、清代舒兰的《河源记》、清代纪昀等人编纂的《钦定河源纪略》等,是考察黄河源头的著作,它们不断修正和刷新了古代人民对于黄河源的认知。《题定河工则例》《河内河工物料价值》《钦定河工实价则例章程》《黄运两河修筑章程》等书,属于河工则例章程类著作,记录了与河工相关的则例、章程等,是了解历代河工的重要史料。

相较书籍古籍而言,国图收藏的黄河古旧舆图更多,大约有400多种。流传至今的黄河舆图,从制作方式来看,早期以刻石、拓片为主,在元、明、清时期以绘本和刻本为主,到了民国时期则以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晒蓝本等为主;从装帧形式来看,有卷轴装、经折装、册页装等,其中有不少大长卷,明代的《河防一览图》长达20米,是我国现存最长、最具代表性的一幅古代黄河、运河工程图。

黄河作为地理要素在舆图上出现的年代

很早。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舆图之一,刻于齐阜昌七年(1136年)的《禹迹图》上,关于黄河的刻画就已经相当准确、清晰。现存最早的黄河专图出现在元代。元代王喜的《治河图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治河工程图。明朝最著名的黄河舆图当属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此图以黄河为主,并行绘出黄河与运河,所绘黄河起自发源地星宿海,直至江苏云梯关入海,黄河两岸堤、坝、闸等防护工程标注醒目、标记详细,对其后河渠图的绘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黄河、运河水利史和古代地图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是黄河舆图绘制的井喷期,国图藏黄河舆图绝大部分出自这个时期,可谓数量众多、类型多样。长卷彩绘本黄河舆图是其中的一大亮点,通常绘制精细,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例如清中期的《六省黄河堤坝情形图》,描绘了起自上源阿尔坦河,流经当时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南六省入海的黄河,并且详细标出了黄河下游沿岸堤坝工程,图幅近7米长。

从内容来看,国图藏黄河舆图中,有描绘河道的河道图,有记录河道迁徙的河徙图,有记录河道漫溢、决口等灾后实际的河患图,有主述堤、坝、埝、堡等堤防工程的河防工程图,也有记载河工器具、工程技术等图表的河工技术图。国图藏黄河舆图在绘制年代、河段区域、内容类型等方面均有鲜明的特征,是最形象、最直观的黄河史料。

黄河滋养了一方土地,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也给沿岸百姓带来过严重灾难。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历史上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基于黄河的重要性及其造成灾害的频繁性和严重性,古代人

民从未停止过对黄河的调查、研究和治理。国图收藏的众多黄河历史文献,正是数千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文化的重现。这些文献涉及黄河区位、保护、治理、开发等方面,构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宝库。这些文献过去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也能在黄河文化的赓续中继续焕发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黄河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举措与手段,其“一廊引领、七区联动、八带支撑”的总体空间布局,承载着“全面推进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化黄河文化研究发掘、提升环境配套服务设施、促进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加强数字黄河智慧展现”五大重点任务。黄河历史文献是古代先贤治河智慧的结晶和治河理论的总结,是研究各个历史阶段黄河变迁、决溢灾害、治河人物、黄河河政和河工技术等赖以借鉴的重要内容。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国家图书馆的交流与合作将对黄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所谓鉴古知今,整理、研究以及充分利用黄河历史文献,兼顾历史与现实,坚持文化引领,有助于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全面阐释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不仅对于当前乃至以后的黄河保护、治理、开发、利用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能打造一张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容的中华文化名片。

(作者陈红彦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翁莹芳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

理论 速递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近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伟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文章,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理论内涵和现实路径,表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总结。

王伟光认为,文化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精神支柱,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完美结合,更好地构筑起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我们要随着历史和时代的进步来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适应;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地位,主动回答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难题,积极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古今贯通构建当代中国古典学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楚简〈诗·召南·驺虞〉与上古虞衡制度——兼论当代中国古典学的构建》一文中,关于《诗·召南·驺虞》的研究分析了历代关于《驺虞》诗的阐释情况,依据最新发现的战国楚简抄本进行了新阐释,进而揭示上古虞衡制度与该诗的深层联系,对该诗研究长期以来未曾解决的难题提出新意见,从而为当代中国古典学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和可能路径。

黄德宽表示,当代中国古典学的构建在继承古典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一是要将传统“小学”与当代古文字学、上古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在“文字”维度上实现古今贯通;二是要将古代文献与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在“文本”维度上实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的融通;三是要在“文化”维度上,既揭示古代典籍及其内涵与历史文化的深层关系,也通过古代典籍的研究展现中华历史文明的本来面貌和演进轨迹,从而揭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规律。

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组织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发布会”,聚焦“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选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路明灯》《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历史考察》《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等五篇理论文章和学术论文,以及《中古文学文献学(增订版)》《古代法制资料钩沉(全十册)》《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区域文明与沟通的意义: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建构》《家国时代的天下之公:古典政治观念的建构》等五部著作。这些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阶段性“答卷”。

本报记者 谢颖 整理编辑



理论速递